

要是由於其內在結構的不平等所致。……中國是同盟中處於弱勢的小兄弟。中國人無法永遠接受這樣的從屬角色。與蘇聯的其他僕從國相比，中國是一個有眾多人口和豐富資源的大國」(頁206)。因此，中蘇分裂是權力之爭的結果，主要是緣於中國不滿處於中蘇同盟中的小兄弟地位。這不單是毛澤東和赫魯曉夫之間的權力之爭，更重要的是中俄兩大民族的文化 and 種族之爭。蘇共領導人看不起中共領導人，這

不僅僅表現為中國作為弱勢一方與傲慢的霸主蘇聯的鬥爭，還表現為毛與蘇聯領導人到底誰掌握絕對真理的鬥爭(頁206)。中蘇分裂這個案例表明，蘇聯領導人最終扔棄了意識形態的考量。儘管中國從表面上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但從現實政治意義上看，中國是蘇聯的敵人。中國領導人也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中蘇關係。與「蘇修」的鬥爭，不如與蘇聯(國家)的鬥爭重要(頁208)。

## 被屏蔽的卡廷事件的真相

### ● 孫傳釗



扎斯拉夫斯基 (Victor Zaslavsky) 著，根岸隆夫譯：《カチンの森——ポーランド指導階級の抹殺》(東京：みすず書房，2010)。

扎斯拉夫斯基 (Victor Zaslavsky) 的《階級清洗：卡廷屠殺》(*Pulizia di classe: Il massacro di Katyn*) 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時，歐美出版的有關文獻已經不下千餘種了。但是，扎氏的這部著作還是引起歐美學術界和讀書界的矚目。1940年卡廷慘案的輪廓今天已經大致清楚了。2010年4月，波蘭總統卡欽斯基 (Lech A. Kaczynski) 在斯摩棱斯克飛機失事遇難後，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 (Dimitri Medvedev) 向波蘭代總統科莫羅夫斯基 (Bronislaw Komorowski) 承諾，開放有關卡廷事件真相的所有國家檔案。如果這一承諾得到兌現，估計歐美會有更多關於卡廷事件的歷史著作問世，眾多尚未搞清楚的微觀疑案或許會有所澄清。

扎斯拉夫斯基的重點並不在更加深入細緻地考證當年幾十萬波蘭

扎斯拉夫斯基的重點並不在更加深入細緻地考證當年幾十萬波蘭被俘軍人下落的疑案，而是着力論證卡廷慘案自1943年進入人們視野之後，特別是蘇聯瓦解前三年間，其真相怎樣被戈爾巴喬夫不斷掩蓋起來的那段歷史及教訓。

戈爾巴喬夫畢竟是一個蘇共黨員，還不能夠與這個黨的領導人的特別規則、行為方式、精神構造絕緣：他想在繼續遵守黨的原則同時，賦予蘇共一些民主的精神，但殊不知蘇共的意識形態、政治傳統、組織結構形態都是與民主強烈敵對的。

被俘軍人下落的疑案，而是着力論證卡廷慘案自1943年進入人們視野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特別是蘇聯瓦解前三年間，其真相怎樣被當政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S.Gorbachev)不斷掩蓋起來的那段歷史及教訓。

2007年該書的德文版在柏林出版；2008年英文版在紐約出版；2010年日文版也問世了(以下簡稱《階級清洗》，引用只註日文版頁碼)。其德文版獲得海因利希·貝爾財團(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頒發的2008年度「漢娜·阿倫特政治思想獎」(Hannah Arendt Award for Political Thought)。由德、法、意、波等國政治學學者組成的評委寫出的授獎理由是：「扎斯拉夫斯基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政權採用的一邊承認蘇共和蘇聯國家權力核心所犯的罪行，一邊採用極力掩蓋卡廷慘案真相的策略，其對卡廷事件教訓有衝擊力的分析，為歐洲史研究做出了貢獻。」(頁147)

筆者讀了該書後感到，中國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害大國，也是一個國民為真實的歷史記憶感到困惑和苦惱的國家，因此很有必要把扎斯拉夫斯基(2009年在羅馬去世)一生最後的著作介紹給對卡廷事件了解不多的中國讀者。中國讀者能讀到原著的話，一定會受到很多有益的啟示。

1988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問波蘭之前，與同事專門開會討論了如何回答波蘭方面追究的兩個重要文件的下落。其一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的秘密附件；其二是1940年3月5日斯大林與政治局委員簽署的命令，決定在卡廷殺死兩萬五千餘名波蘭

戰俘。在這次會議中，蘇共中央總務局長、檔案館負責人鮑爾廷(Valery Boldin)對戈氏說自己曾親眼目睹過這兩個文件，並描述了文件的模樣。戈氏聽了鮑爾廷的敘述後，「並不對這些文件的存在表示意外」。當時，負責國際事務的蘇共書記梅德韋傑夫(Vadim Medvedev)表示：「再沉默下去違背我們承諾信息公開的原則，不是妥當解決方法」。但是，戈氏還是聽從了克格勃(KGB)頭目契爾年科夫(Viktor Chebrikov)的主張，堅決反對公開承認這兩個文件的存在。後來，在訪問波蘭期間，戈氏敷衍對方說：沒有找到原件；在只有複印件的情況下就正式承認原件的存在是不負責任的(頁103-104)。

1989年春天，因波羅的海三國代表責問，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主席雅柯夫列夫(Aleksandr Yakovlev)在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再度提起這兩個文件時，戈爾巴喬夫一邊禁止公開文件，一邊還是反覆說謊：「原件還沒有找到。」(頁103)直到那年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把《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附件德文版的複印件公開之後，戈氏才在該年12月召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正式公開承認這個「違背蘇聯人民意願的」、「侵犯波蘭、波羅的海三國、芬蘭主權和獨立」的秘密附件的存在(頁106-107)。

至於斯大林為首的政治局簽署處死卡廷俘虜的文件，其最後發現的過程更加迂迴曲折。1987年，蘇波兩國學者組成了一個共同調查研究委員會，其中的蘇聯歷史學家偶然在一個並不屬於KGB檔案機構的「歷史檔案管理中心」發現了一個

「特別檔案庫」，存有九千頁涉及波蘭戰俘的當年內務部人民委員會(NKVD)總部的檔案。這一發現還沒有讓戈爾巴喬夫感到不得不向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公開斯大林的屠殺命令，其實他知道原件在哪裏。戈氏接受了蘇共中央國際部主任法林(Valentin Falin)的建議，在給雅氏的信中稱：歷史學家發現的這些檔案是在國家檔案館之外的地方找到的，而卡廷慘案是NKVD領導一手造成的。同年4月，《真理報》報導了發現這些檔案的消息，聲稱完全是貝利亞(Lavrentiy Beria)和梅爾科洛夫(Vsevolod Merkulov)的責任，是他們個人決定的，似乎與蘇聯黨和政權毫無關係。直到那一年10月，戈氏才代表蘇聯政府公開向波蘭道歉，並把這些檔案箱轉交給波蘭政府。

按照扎斯拉夫斯基的說法，「這些檔案沒有甚麼大價值，只證明當時一些具體情況」(頁121)，而決定性的證據——斯大林他們簽署的文件——依然深藏宮中。直到1991年戈氏向葉利欽(Boris N. Yeltsin)移交權力的時候，葉氏才拿到這份被稱為「炸彈」的「第一號特別機密文件」。葉氏在1992年決定設立俄羅斯總統檔案館，成立專門委員會處理密封的前蘇聯檔案。也是在那一年，葉氏把這份文件交給了當時的波蘭總統瓦文薩(Lech Walesa)(頁124-25)。

在敘述了戈爾巴喬夫在三年間始終不願意公開這兩份文件的來龍去脈之後，扎斯拉夫斯基轉入正題，提出以下的疑問：戈氏為何一邊提倡信息公開、政務透明，一邊如此頑固地阻止公開《德蘇互不侵

犯條約》的秘密附件和卡廷屠殺文件？扎氏的結論是：戈氏畢竟是一個蘇共黨員，還不能夠與這個黨的領導人的特別規則、行為方式、精神構造絕緣：他還在繼續遵守黨的原則同時，賦予蘇共一些民主的精神，但殊不知蘇共的意識形態、政治傳統、組織結構形態都是與民主強烈敵對的。扎氏指出：「雖然他知道堅持以前那樣強調卡廷事件是德國人幹的說法的話，自己的所謂信息公開和政務透明的政策許諾就會失去信用，但是他又擔心來自黨組織、KGB、軍隊那些陳腐管理機構的強大抵抗，所以想找到一種『最小代價的解決方法』。他完全知道公開這些文件，對自己的黨和蘇波關係來說，都有很大破壞力。」(頁137)既然還要維持這個黨和政府，戈氏拒絕公開這些文件，並不奇怪。

扎斯拉夫斯基認為，戈爾巴喬夫頑固地阻止公開這些秘密文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在卡廷事件中，沒有法庭審判、沒有正式起訴手續、連起訴書也不唸，就決定槍殺波蘭戰俘，這意味着，可怕的罪行最終無法歸咎於當時鎮壓機關的成員，而要歸咎於今天他所領導的黨和國家及其領袖。決定在卡廷實施戰俘屠殺的機密文件，完全違背了所有法的概念，特別是違背了國際法的所有準則(頁138)。扎氏在書中詳細復原戈氏隱瞞歷史、阻止秘密文件公開的史實，試圖說明即便在蘇聯解體十多年的今天，傳統的意識形態依然在很多蘇聯國民和在蘇聯社會中發揮着影響力。

2004年，俄羅斯軍事檢察院以「沒有證據證明曾有過對波蘭民族大屠殺」為由，停止了1989年開始的對1940年代屠殺波蘭市民的調查。

戈爾巴喬夫頑固地阻止公開這些秘密文件的重要原因在於，可怕的罪行最終要歸咎於他所領導的黨和國家及其領袖。扎氏在書中詳細復原戈氏隱瞞歷史一事，試圖說明即便在蘇聯解體十多年的今天，傳統的意識形態依然在很多蘇聯國民和在蘇聯社會中發揮着影響力。

二戰期間和戰後，在如何揭露卡廷事件真相的問題上，英美的表現也很骯髒，在得知真相之後，只考慮本國私利，從政治功利主義出發，無視卡廷事件，這也是助長前蘇聯政權能長期隱瞞真相的一個原因。

這五年中，沒有一個參與屠殺的罪犯遭到起訴(頁2)。扎氏在該書中舉了另一個例子：2006年初，一位寡婦向俄羅斯軍事檢察院提出為自己丈夫(卡廷事件被害軍官)恢復名譽的要求，等候多年後，才得到俄羅斯軍事檢察院的回覆：她的丈夫作為波蘭戰俘不適用恢復名譽的法律條文，不屬於恢復名譽的對象，恢復名譽只適用受政治迫害的對象；況且，檢察院無法判定其丈夫和其他人是根據當年刑法哪一條被處刑的，當年的預審檔案都被銷毀了(頁86-87)。

事實上，根據現已公開的部分檔案得知，早在1959年，在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批准下，蘇聯政府為了在歷史上永遠埋葬卡廷事件的真相，銷毀了一批檔案。扎斯拉夫斯基對俄羅斯軍事檢察院的這一無恥行徑表達了強烈的憤怒，認為這是權力的傲慢和法律的遊戲。俄國最高法院不是為1918年被殺害的皇帝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及其家族恢復了名譽嗎？也沒有說明當年是根據哪一條刑法處死的(頁143)。顯然，在應對寡婦的申訴時，俄羅斯軍事檢察院依然採用蘇聯時代的手法。調查過程中涉及183種檔案，內有36種屬於國家級機密，80種屬於一般機密。蘇俄政府前後向歷史研究者公開的檔案總共只有67份。如前所述，直到2010年4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才向波蘭代總統科莫羅夫斯基承諾，開放所有關於卡廷事件的檔案。此後，俄羅斯軍事檢察院才重新開始調查有關案件的原委。

扎斯拉夫斯基指出，二戰期間和戰後，在如何揭露卡廷事件真相的問題上，英美兩國的表現也很骯

髒。這兩個國家在得知真相之後，只考慮本國私利，從政治功利主義出發，無視卡廷事件，這也是助長前蘇聯政權能長期隱瞞真相的一個原因。1943年，德軍在卡廷森林發現波蘭被俘軍官屍體之後聲稱是蘇軍殺害的。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認為這事件沒有世紀性的重要性，輕描淡寫地對波蘭流亡政府領導人希克爾斯基(Wladyslaw Sikorski)說：「他們已經死了，你再追究，也無法使他們復活。……我們不能忘記這一事件，但是不能對外說。」(頁66)幾天後，邱吉爾就此事安慰蘇聯駐英國大使說：「我們必須協力擊潰希特勒，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頁67)後來，英國政府無視波蘭流亡政府提供的證據，繼續強調：「那只是德國人延遲戰敗、想使得歷史停止下來的徒勞的宣傳。」(頁75)在收到波蘭流亡政府的備忘錄後，邱吉爾在轉達給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信中說：「這是可怕的備忘錄」，「請再也不要傳閱」(頁74)。

羅斯福在接到其友、駐巴爾幹特使阿爾(George Earle)關於卡廷事件的報告後，表示這只是德國人的宣傳，不許阿爾把這事件公諸於眾(頁75)。根據瓜分戰後世界的《雅爾塔協議》(Yalta Agreement)，1945年以後，羅斯福和邱吉爾乾脆把整個波蘭交給了蘇聯，這是對波蘭最大的背叛。

英美兩國在戰後也沒有改變在卡廷事件上的這一立場。美國政府至少到1951年還是禁止談起卡廷事件(頁76)。儘管戰後英美兩國協助蘇聯截斷了獲取真相的途徑，但就是在這一史料貧乏的歲月裏，有良知的研究者對卡廷事件還是做了出

色的歷史考證。波裔美國學者扎沃德尼 (Janusz K. Zawodny) 1962年出版的《森林死亡》(*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在不少新史料得見天日的今天，依然不失其在卡廷事件研究史上的名著地位。

扎斯拉夫斯基之所以把追究和論述的焦點放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附件和斯大林與政治局委員簽署的在卡廷屠殺波蘭戰俘的這兩份文件，是為了強調歐美政府和歷史研究者在戰後都忽視了德蘇兩國體制特徵上的親和性和相似性，忽略了德蘇條約秘密附件自身所蘊含的極端危險的歷史啟示。德蘇兩種體制都打着革命的旗號，都製造了一個國民的敵人，都依賴謊言和暴力維持恐怖政權。與納粹的「民族清洗」不同的是，斯大林打的是「階級清洗」的旗號，都是要從肉體上消滅某一個所謂的「敵對群體」。

有時候，「階級清洗」也只是一個表面口號。在清洗烏克蘭富農之後，蘇聯也會轉向對波蘭的「民族清洗」。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附件中，莫洛托夫 (Vyacheslav M. Molotov) 與里賓特洛夫 (Ulrich F. W. J. von Ribbentrop) 約定的是要共同在地球上完全消滅波蘭這個國家及其民族。二戰期間，在波蘭東部消失的不僅是在卡廷被屠殺的二萬多軍官和知識精英，而且是十幾萬被俘軍人和幾十萬波蘭平民；二戰之後，整個波蘭成了蘇聯的衛星國。在這種意義上，卡廷只是奧斯維辛 (Auschwitz) 的一個縮影。

最近，俄國歷史學家沃爾科夫 (Vladimir Volkov) 通過研究指出，1937至1941年是蘇德兩國的蜜月時期。1939年德蘇條約簽訂後，莫斯

科也出現過加入德、意、日三國同盟，從而擴大為德、意、日、蘇四國同盟的構想。如果不是希特勒過低估計蘇聯的軍事力量，這一同盟很可能成形 (頁132-33)。

戰後，人們過度誇大、強化了斯大林政權對德作戰的功績，忽視了卑鄙、殘酷的德蘇條約所隱藏的本質及其後果。蘇聯瓦解後十多年來，俄羅斯當局還是採用這種將強化和忽視結合起來的傳統宣傳手法，來控制歷史記憶。這一做法，在使俄羅斯國民形成國家共識 (民族共識和民族認同) 上，依然取得了完全成功。一位俄國學者說得好：「實際上，塑造戰爭神話就是要壓制人們對古拉格的記憶，重新命名和壓制人們對非理性的不公正的蘇維埃體制下的苦難受害者的記憶。戰爭神話的『大熔爐』把屠殺者和受害者等同起來，把整個社會團結起來對付德國這個共同的敵人。這種英雄敘事把從前的罪惡都掩埋下來。」(卡帕瓦 [Dina Khapaeva] 著，吳萬偉譯：《被遺忘的歷史：後蘇聯社會的哥特式道德》，www.xschina.org/show.php?id=13247。) 扎斯拉夫斯基的《階級清洗》一書，就是要提醒人們警惕這種把戲。

但是，就在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做出開放所有關於卡廷真相之國家檔案的承諾後，俄國軍事檢察院卻無視總統的許諾，表示根據現行法律，無法追究罪犯的法律責任。在2010年紀念卡廷慘案七十周年之際，有俄國政治家還以1920年蘇波戰爭時蘇聯三萬戰俘在波蘭遭受虐待為由，拒絕就卡廷事件向波蘭道歉。卡廷事件真相完全得到呈現、受害者得到昭雪、罪犯得到懲罰的路途，肯定會相當漫長和曲折。

蘇聯瓦解後十多年來，俄羅斯當局還是採用將強化和忽視結合起來的傳統宣傳手法，來控制歷史記憶。這一做法，在使俄羅斯國民形成國家共識上，依然取得了完全成功。《階級清洗》一書，就是要提醒人們警惕這種把戲。